



读史札记

大盛应惧

□ 滴水石

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在历史上饱受争议。《晋书》中评价:“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说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唐太宗李世民以司马炎为鉴,对他平吴之前也赞赏颇多,认为他“据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辘轳之贡,去雕镂之饰,制奢侈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晚清文史学家李慈铭说:“晋武帝纯孝性成,三代以下不多得”……作为汉代以后结束三国鼎立纷乱局面、再次建立大一统王朝的皇帝,他的雄才大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建立的王朝在历史长河中真可谓昙花一现。自立国不久,西晋就开始纷乱叠起。二十四年的执政生涯,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导致八王之乱,西晋王朝五十二年便换代,中华大地又被五胡所乱,重新进入更加分裂的时代,由此一些研究者认为他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建立大一统王朝的一代雄主,怎么会一下子变得昏聩不堪呢?细读相关史书后,我觉得北宋思想家、文学家苏轼的分析比较精准:“武帝之为人,好善而不择人,苟安而无远虑,虽贤人满朝,而贾充、荀勖之流以为腹心,使吴尚在,相持而不敢肆,虽为贤君可也。吴亡之后,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贤臣,近小人,去武备,崇藩固,所以兆亡国之祸者,不可胜数,此则灭吴之所从致也。”无论《晋书》还是《资治通鉴》,都能看到司马炎的昏聩起自平吴之后。苏轼说得很清楚,东吴尚在,与晋相峙,司马炎“不敢肆”。司马家族从司马懿开始,在三国鼎立天下纷乱的格局中,呕心沥血,逐步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司马昭平蜀汉,平吴重任历史地落在司马炎肩上。司马炎“宽惠仁厚,沈深有度量”(《晋书》)“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晋书》)何曾言。肩负重任的司马炎,登上帝位,“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驰,宽而能断,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明民乐其生矣”(东晋文学家、史学家干宝语)。开朝初始,司马炎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雄才大略,广开言路,无为而治,厉行节约,进行改革,经过多年战乱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逐渐复苏起来,国家一片繁荣,被称为“太康之治”。所以苏轼说他“虽为贤君可也”。

但是,平吴战争一结束,司马炎不管是政治还是用人,不管是生活还是脾气性格,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帝既平吴,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资治通鉴·晋纪三》),他平吴后认为天下一统,自己开创了举世伟业,功德圆满,遂纵情声色犬马。皇宫内的妃子他嫌不够,下诏禁止民间婚嫁,派官吏去民间选美。平吴之后,他下令将东吴末帝孙皓后宫的五千姬妾全部纳入自己的后宫,使后宫人数史无前例地达到万人。万人佳丽选谁幸?也只有司马炎做得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寝宴”(《资治通鉴·晋纪三》),天下万事不管,夜夜驾驶个羊车在后宫游荡,羊停在哪个宫门前,就选择在哪个宫宴寝。后宫之女争向临幸,“竟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羊车”(《资治通鉴·晋纪三》),“竹叶羊车”这个典故活脱脱地画出了司马炎昏聩透顶之状。“方今世运垂年,将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使百姓踴多幸之德,笃始终之行,曲惠小仁,故无取焉。咸使知闻”(《晋书·卷三》),泰始三年春天,司马炎下的这个诏书,与“竹叶羊车”真可以说是言行相诡。自己夜夜忙在后宫,还说要道德仁义来教化百姓,用真善丑恶来诱导和警戒百姓,真是莫大的讽刺。

“八王之乱”的祸根起自于司马炎的大兴分封。有研究者认为,司马氏举兵夺权时几乎没有遇到曹魏宗室的阻止,因此,为了吸取曹魏的教训,司马炎登上皇位大肆分封。当然不能否定有这个因素,但我觉得与“竹叶羊车”一样,此时的司马炎正如李氏所说,他“见土地之广,谓万弃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普天之下都是他司马氏的了,司马氏的子孙理应享受胜利的果实。他不仅给宗亲、叔伯弟封了27个王侯,而且把国家的军队取消,给这些王侯实打实的军权。这些王侯经济上有征税的特权,政治上任命本国官吏的任免权,再加上手握兵权,这样的王国焉能不图大逞强?父子都能争皇位,何况这些宗亲、叔伯弟侄的王侯?他们不觊觎皇位,可能吗?所以,即使司马衷不是白痴,就是再来一个司马炎,天下不可能不乱;即使没有强悍野蛮疯狂弄权的贾南风,就是来个贤淑之女,天下也不可能不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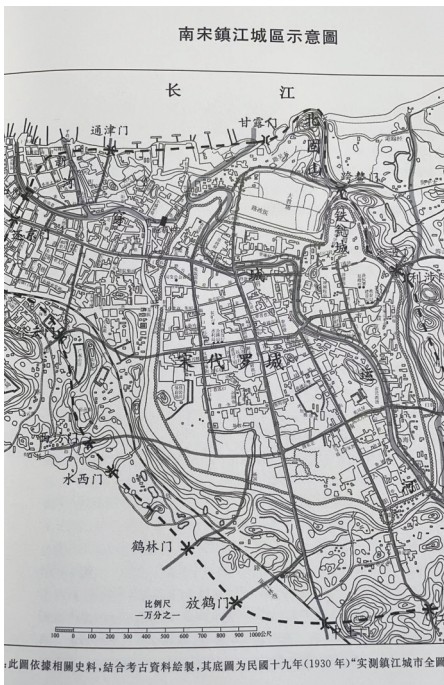
司马炎一统天下时,“内有张华,外有羊祜、杜预,筹谋策画,经纬咨询”(唐朝宰相刘仁轨语),平吴之后,西晋难道没有贤宰直臣了吗?有!苏轼说“贤人满朝”。可司马炎的政治、军事、生活思想观念全变了,谁说他欢心谁就是忠臣,谁让他舒服谁就是贤臣。于是贾充、荀勖之流成了西晋最有才干的人,成了司马炎最信任的人。至于其他人,就像张华一样,经常让他不舒服,都渐渐疏远了。蔡东藩说得非常对:平吴以后的司马炎“乃被欺于狡吏而不知,幸情于皇孙而不知,受腰于宦帝而不知,卒至一误再误,身死而天下乱”。

北宋贤相王旦,为相十二载。《王旦教诫子弟》记载,他对子弟常说:“我尝以大盛为惧。”他所谓的大盛为惧,是指事业、权力最鼎盛时,常感到惶恐,担心有负臣之职和天下百姓。司马炎的教训,正在此。泰始元年冬季,他在郊外举行祭天仪式,礼毕后下诏说:“惟朕寡德,负荷洪烈,托于王公之上,以君临四海,惴惴惟惧,罔知所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贰之臣,乃祖乃父,实左右我先王,光耀我大业。思与万国,共享休祚。”(《晋书·卷三》)这番谰言,大有王旦“我尝以大盛为惧”之意。他登上帝位确实应该“惴惴惟惧”,因为为了解决对自己构成巨大威胁的弟弟司马攸,留下了严重的政治后遗症;奸佞像幽灵一样始终觊觎着权力中心;姻亲势力又不能与其一心一意;司马宗室看重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根本不满意帝位局限在司马炎一脉。司马炎实际上是坐在火山口上的。平吴之战,既让司马炎充分发挥其政治军事才能,也让西晋各种政治势力暂时找到了一致的目标。而平吴之后,司马炎的政治危机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因为他“恣纵逸乐,一味任情而动,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始忌之恶”(干宝语),让各种势力找到了可乘之机,危机更加深重。故苏轼说:“所以兆亡国之祸者,不可胜数,此则灭吴之所从致也。”

大盛应惧!司马炎让西晋上天入地的这段历史,确实该让后人明白这个道理。

宋代镇江的一次“水体治理”

□ 孟宪成



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二月的一天,镇江太守赵善湘公务不甚繁忙,一时觉得十分轻松,于是信步走出官衙,来到不远处的子城之上登临月观。月观前身为始建于东晋的万岁楼,位于子城西南角。子城依托月华山(今北固山前峰)而建,山上建城,城上建楼。汪藻《月观记》云:“望数百里而见者,月观也。”虽为夸张之辞,却也足证此楼的高大壮观。

凭栏月观之上,吹拂着早春和煦的微风,赵善湘饶有兴致地环视着脚下这座尚算陌生的城池——他去年十二月刚刚到任,此时未及三个月。向南眺望,远处岗峦起伏,正是镇江南郊诸山。目光收近,不远处的一小水塘突然映入他的眼帘。只见水塘位于子城西南墙外(今第一楼街南端东侧),塘中栽种着一片荷花,本倒也算赏心悦目,然而塘边却大煞风景地随意堆积着脏土,四周搭建的房屋也显得十分凌乱,使本就不大的水塘愈发显得局促狭小。

赵善湘疑惑地向左右的随行人员此为何地,得到的回答是:“放生池。”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放生池是绍兴十三年(1143年)宋高宗赵构诏令天下诸路各州置立,理应堂堂皇皇,护理有序,而不该是眼前这破败的模样。

回到官衙,赵善湘立即命人将库房中所存的镇江府志与图搬来查阅。得知镇江放生池本名秦潭,又称绿水潭,据传为秦始皇所开,潭水深不可测,岁旱不涸。陆龟蒙诗:“松门穿戴寺,荷径绕秦潭”;李仲殊诗:“百丈古潭深,鱼虾不计金。好来秋夜听,深处有龙吟”即言此潭。绍兴十六年(1146年)改置为放生池。但旧志记载仅有条目简介,而无详细内容,昔日规模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可考。赵善湘看到的放生池不仅淤塞严重,而且池岸长期受侵蚀浸泡,周边的房屋有垮塌的危险。更重要的是,此处乃皇帝亲建的场所,岂能成为有碍观瞻之地。看来整治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决心下定后,赵善湘亲自带领部属来到放生池边,开展实地调研。第一步当然是要摸清原池的四至范围,于是他命人走访居住在附近的故老,果然有了收获。据知情的老人说,几十年前放生池的面积比现在要大上一倍有余,后来因为公务接待的需要,官府把这里借辟为游玩的景点,临池还建起了酒家,于是池面就日渐狭矣。老人还指着池边的一座小屋道:“这就是

旧南山亭。”当年此亭中整日里歌载舞,酒宴不绝,如此这般有好多年。沿池的居民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并缘为奸,偷偷地将杂物脏土倾倒入池中,进而把填埋而成的土地占为己有,并在上面盖起房屋。若是仔细观察放生池的高低走向,旧有的池面轮廓宛然可见。

随后的部属和故老都认为居民的侵占行为非常清楚,他们向赵善湘建议:“可以责令沿池房主拿出地契来验证,必然可以查清真相。”赵善湘认为此举可行,但必须选择敢于担当之人来执行,因为此事积累日久且涉及各方切身利益,解决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矛盾,需要执行者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同时他也已经了解到,其实前任镇江知府也曾有过整治放生池的念头,但终因困难重重而不了了之。思考一番后,赵善湘认为治下的丹徒知县姚元特是合适的人选,于是召他前来商议,诚恳礼待,晓以大义。姚元特深为感动,毅然领命。

不日,姚元特带领县里的衙吏们来到放生池,大张旗鼓地开始现场查验。他们对沿池房屋进行测量,当场与房主持有的地契验证,凡是超出地契范围丈尺以上的,一律认定为放生池的旧地,全部复归官府。雷厉风行的推进,公开公平的操作,让房主们无话可说,只得默默接受。就这样查验完成后,收回的土地总量已然相当可观。于是赵善湘见好就收,而没有穷追不舍,毫厘必究,以避免矛盾激化。他公开宣布道:“之前的侵占行为,属于几十年来的陈年旧事,不再追究责任。”还与房主们约定,凡是自行拆除所占土地上建筑设施的,费用由官府来承担。宽严并济的举措使得退占、拆除和迁移等相关事宜进展得十分顺利,很快就全部收回了被侵占的土地。

在开展现场查验的同时,赵善湘下令征召三百名夫役,对放生池进行整治和修复。官府所占之地没有争议,即先从这里开始,修辟道路,设立门楼,在池东侧建起五座亭子,位于池水最深处的一座亭子被重新命名为“南山亭”。每座亭前建有长廊,两旁盖起房屋,作为郡县军官值守的住所。整个建筑排列宽敞整洁,丝毫没有狭隘拥挤的感觉。原先官府自建的酒家也被拆除,地块作为放生池的边缘所在,杜绝闲杂人等入内。民地退还后,即砌筑高墙将其围圈起来。墙内修建绕池的小径,宽合3米余,以方便观赏和来往。池边广植柳树,以作护堤之用。原来用脏土填埋出来的地方,不宜建筑,即在此处取土用来砌墙,取土后的凹陷之处作为新辟的池面,如此一举两得,围墙砌成而新池也开挖完毕。经丈量,新的放生池周长约合600米。

放生池整治于七月开始,十月结束,历时四个月之久。完工后的第十八天,正值宋宁宗赵扩的生日,赵善湘特地在放生池畔举行庆典仪式。当天清晨,阴雨歇停,天色放晴,只见亭池一新,开阔绚丽,一扫往日颓废之气象。池中碧波盈盈,鱼儿浮游,令人心旷神怡。参加庆典的官员、工匠和围观的百姓们都显得喜气洋洋,可见放生池整治是一件颇得人心的事。赵善湘命人在池边立石为界,将放生池的图形刻于石背,以备日后考订。自己则作记以载其事。

放生池整治后的第三年,嘉定十七年(1224年)赵善湘拜大理少卿,迁右文殿修撰,离开镇江。宝庆二年(1226年)再任镇江知府,次年改任建康(今南京)知府。他两守镇江,前后达六年之久,在任期间修筑旧城,鼎新坊巷,颇有治为,在镇江历史上留下了清誉。

回忆50年前的秋收秋种

□ 赵理章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正是我步入成年成为一个“新农民”的时候。好多农活是在又苦又累的情况下“干中学,学中干”的。农忙期间我最害怕,因整天赶时间,超强度的日工夜工,轮换种,对于我们这些刚开始全天干农活的“半大人”来说,实在受不了。

那时我们生产队有280多亩土地,总人口130多人,男女劳动力80多名,农业生产是在没有一点机械化的程度上,全是由人工完成收种任务的,有句谚语:“重阳无老少”“霜降一起倒”,意思是所有的秋熟作物,到了农历的九月九重节气就不分嫩与老,到霜降的节气时都可以收割。此时,秋收秋种的“大幕”也就正式拉开了。

我们生产队收割稻谷有分时段、分人、分任务,一个劳动力割一亩稻子给一个劳动工分(我队里那时一个工分在0.26元至0.38元钱之间)。收割稻子在保证数量的同时还要求有质量,割六棵稻子为一把,在割第一棵时稻茬要留长一点,这样可把割下来的稻子根部放在第一棵的长茬部分,使其容易晒干,第二把六棵割下来交叉放在第一把的上面,每两把放一茬根上。阳光好时三天后稻子扎成小把,收挑上场。稻子割在田里,

最担心天下雨,一旦下雨我们是手足无措的,因没晒干的稻子雨前抢收上来,堆压在谷场上,会发酵腐烂,如不抢收稻谷淋在田里,隔几日后稻谷又会发芽霉烂。遇上这种情况我们生产队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的程度,采取的办法是先把稻谷扎成一小把一小把,然后再一小堆一小堆,堆码在田埂上,待雨停地干时担运到打谷场。那时打谷场全是土质的,200余亩水稻一下子上场堆放是不可能的,每天必须把已上场的20亩或30亩的稻谷先脱粒完成。

我们白天在田里收稻,晚上在场上脱粒,村上那时已通上了电,生产队唯一的农机就是一台电动脱粒机。我们开夜工时九人组一个班,分为上半夜一个班,下半夜一个班。下夜班的时间是夜里12时至早晨5时。每班的具体分工为:脱粒机上4人,机后捆稻草2人,机前招扒乱草、稻谷一人,搬抱稻把供机脱粒一人,拎、堆放稻草一人。这些分工中最辛苦的是机上脱粒的人员,站在那里几小时,双手握着稻把子向左右不停地翻动着稻把,摆动着身子,把稻把分开小心翼翼慢慢地向后移向前移,稻把上不遗留一粒稻谷。机上的人员既累又脏,还有安全隐患。如有的稻把过潮湿

时,稻把上机一不小心搭上去,手有时会同被卷上脱粒机,手指手背瞬间被机齿打得血肉模糊。谷场开夜工脱粒共分4个班,由我们生产队年轻的劳力男女搭配组合,开一个夜工隔一夜,轮流一次上、下半夜。脱粒下来的稻谷当天要扬净晒干,这些秋熟的稻谷,是全年公粮任务的大头,需及时送到镇粮站。秋季有十几万斤的稻谷,在同期上场是无法存放的,必须得边脱粒,边扬晒,边送运。

稻谷脱粒秋收这方面做得差不多时,生产队要集中精力攻秋播秋种,稻谷全部上场以后,稻田要及时翻耕,斩垡,挖沟种上三麦。200多亩田的翻耕任务,在很短的时间里由我队里的五只水牛来承担。那时候田里的耕牛也是很辛苦的,与人一样,既做得苦,还没有吃的,大忙时万物收枯,青草变成老草,人也吃不饱的时候,不可能有粮食喂牛的,在耕田前,饲养员总是弄一点草糠(稻草碾碎的)淘淘水喂喂牛。刚收割完的稻谷晒干,未经风吹日晒,大都很泥泞,耕翻出来的长条泥埂子又湿又黏,必须用锄头把泥埂子斩碎细才可播麦种,斩泥埂子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活,白天起不了,逢月夜就开夜工斩泥埂,每一个劳力分一段田块,硬任务,不论你斩到夜里几点钟,当夜必须完成分给他的斩垡段块。

在晚间斩好的泥埂田块上,白天再施用上农家畜粪堆的堆肥灰。好几十立方的灰肥从场角到田间,我们饿着肚皮不知要挑多少担,不知要往返多少次,肩头整天压着重,不知要跑多少路。基肥施后,再播上麦种。播麦种的同时还有一项更重要更辛苦活——挖沟。三麦生长期最怕水,所以田间的排水沟也格外重要,我们队里大部分的田块都已成方,每亩左右长方形的田块,长80余米,宽15至16米,每块田里的沟要挖上好几条。挖300米队里给我们一个劳动工分。挖沟还需符合三个标准,一是沟的直度,二是沟的宽度,三是沟的深度。每天傍晚收工前由队里的农技员测长度,验标准,按质打折给工分。我们为了多挖多得工分,心里磨出了好多水泡。水泡破了的时候忍痛仍坚持在挖,一天为了能多挣上几分工,中饭碗一放,就跑到田间。秋收秋种在农历的十月左右,是白天短夜天长的时节,称“十月中梳头吃饭都是工”。

霜含柿子鲜

□ 鲍安顺



霜降日,我去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看关中大地的柿子。当地人,叫火晶柿子,因为阳光照耀下,它晶莹剔透,红得透亮耀眼。那天,我在关中深山里,一眼望去,漫山遍野红彤彤的柿树,红得绚烂辉煌。

古人说“红霞白霜,摘柿爆桑”,说霜降时节,是摘柿好时光。明人蔡文范诗云:“露脆梨白,霜含柿子鲜。”道出柿子,在霜降时成熟,经霜味鲜美。还有诗写柿子“待到风霜甜不溜”,说只有经霜打,味才甜,才可采摘。更有诗写得确切:“秋天小凉京人骨,无人不道柿子熟。红颜未破馋涎落,油膩香甜世上无。”俗话说“霜降吃丁柿,不会流鼻涕”,还说“霜降吃丁柿,眼睛才会金”,那不流鼻涕是健身,眼里出金,是养眼,也是养生传统。农谚说:“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软枣”“霜降不摘柿,硬柿变软柿”。柿子全身是宝,柿霜、柿蒂、柿叶,皆可入药。

明朝张定撰写的《在田录》记载,朱元璋小时候逃荒,两天没吃东西,饿得两腿发软,眼冒金星。此时他看见一棵柿子树,结满了红彤彤的柿子,便喜出望外地爬到树上,将柿子吃了个精光。后来他当皇帝后,在一年霜降日,率领大军路过那棵柿子树时,看着熟透了的柿子,感慨万千地对文武大臣们说:“若没有此树,朕早已饿死了,它是寡人的救星啊!”说罢,脱下红色战袍,披在柿子树上,封它为“凌霜侯”。从此,民间就有了霜降吃柿子的习俗。

苏东坡在《睡起》中说:“柿叶满庭红颗熟,薰炉沉水度春篝。”陆游在《秋获歌》中写道:“墙头累累柿子黄,人家秋获争登场。”北宋诗人张仲殊赞道:“味过华林芳蒂,色兼阳井沈朱。轻匀绛蜡裹圆酥。不比人间甘露。”早年,柿子是中国人过年必备的年货之一,“柿”谐音“事”,有“事事如意”的美好寓意。两个柿子和一只如意图,取吉祥之意,融入了古人心智。

柿子在霜降前后成熟,皮薄肉鲜味美,营养价值极高。不过,柿子不能空腹食用,一次不能多食,它性寒凉,脾胃虚寒、体弱多病、病后初愈、产后气虚、外感风寒等人,应少吃或不吃。柿子含糖量高,糖尿病及慢性胃病的人,不要吃。柿子不宜与螃蟹、红薯、海鲜一起吃。

